

有幸與君同斯世： 敬悼李亦園大兄

● 金耀基

得悉李亦園先生於今年4月18日離世的消息時，我不止感到哀傷，更感到有些自哀。錢穆先生說過：「朋友的死亡，不是他的死亡，而是我的死亡。因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，即是他並未死去，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卻消失了，等於我已死去一分。」說得多麼真切呀！亦園兄走了，但他的言行面貌卻湧現在我眼前，他沒有死去，他活在我心中，活在他的朋友心中。

亦園大兄長我五歲，可算是同輩之人，但我讀到《文化與行為》等著作時，他已在台灣大學教書，而我剛第一次留美(1965)返台。我於1966年出版闡論中國現代化的《從傳統到現代》就不止一次引用了他的論點。李亦園先生是李濟之、董作賓、凌純聲等前輩學者之後，在台灣的人類學與民族學上承先啟後的主要學者。除短期赴哈佛大學進修外，他的整個學術生命都在台灣。他勤困治學，鑽研不懈，不止田野工作做得出色，理論性普及化書寫也一樣出色；而教學上更受青年學子的愛戴，數十年來，他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、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以及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苦心經營，成績斐然，培植了多位今日在台灣的人類學與民族學上掌旗的領軍人物。

近半個世紀裏，亦園兄在台灣，我在香港，1970與80年代初，台港兩地絕少交流，但亦園兄與我在學術志趣上有不少交集，彼此心中可謂相知相重。亦園兄主持中研院民族所時，我被邀擔任所外學術諮詢委員，我欣然從命，亦因此開啟了70年代後我與台灣學術界的交往。及今回憶，我與中研院之結緣也是在那個時候；更記得1994年我當選為中研院院士，而提名我為院士候選人的正是李亦園與許倬雲、余英時幾位我素所敬重的學人。

我與亦園兄自70年代交往以來，都是在開會時才碰面，幾乎沒有私交可言(這是我今天頗感遺憾的)。我與他在80年代中期後，開會定期見面的機會增加了。自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，兩岸三地的社會科學界都有建立、促進交流合作的強烈意願。幾經磋商周旋，大約在80年代中就有了一個以「中國文化與現代化」研討會為平台的三地社會科學界交流、合作的機制。每兩年，三地輪流舉辦「中國文化與現代化」研討會，每次會議均有一專題(如家庭、農村經濟發展、城市化等)。香港有喬健、李沛良和我為召集人，大陸有費孝通、馬戎、潘乃谷為召集人，台灣則有李亦園、楊國樞為召集人。費孝

通先生當時已是逾古稀之年的學者，但精神矍鑠，思維清晰，每次研討會他都出席，並提出認真、充實而有新見的論文。亦園兄與這位同行前輩最為投契，二人亦是相知無隔。每次研討會參與者都有三十到五十之數，可謂群賢畢至，少長咸集。我與亦園兄屬中生代，有許多共同語言，但我們所談無不是有關社會科學在兩岸三地發展之事。誠然，我們偶爾亦會談到學界內外的人與事。在我印象中，他對前輩與後輩盡多寬厚、寬容與讚許之詞，對同輩亦多不吝的推美，至於對有些不堪（不是全無學問或才華）之人，則往往止於搖頭、嘆氣。我對亦園兄之心量、判識與人生境界是很有體會的。

從90年代開始，我與李亦園先生在1989年成立的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」每年又有兩次定期共同議事的機緣。我先是基金會的學術諮議委員，後期是基金會的董事。亦園兄是基金會的創始人之一，也是基金會第一任執行長，多年後他繼李國鼎、俞國華之後被推選為基金會董事長，主持基金會長達二十年之久。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」是台灣第一個面向國際的學術交流基金會，由政府與民間共同捐資成立，旨在獎助世界各國學術機構與學者進行有關中華文化、華人社會與台灣發展經驗之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，並促進海內外學術機構交流合作。基金會成立迄今，申請獎助之機構與學者數以千計，地區遍及五大洲，逾百所世界著名大學或研究機構（如哈佛、耶魯、普林斯頓、斯坦福、芝加哥、柏克萊、牛津、劍橋；中研院、台大、政大、清華等）皆在其列。基金會之核心審議工作分由台灣、美國、歐洲、亞太及新興五個諮議委員會負責，五個諮議委員會由海內外逾百位人文及社科學者組成。審議工作者皆以學術為標準，客觀、嚴謹而具公信力。基金會久已享有世界性的口碑與聲譽，它之所以有如此成就，固然是基金會成員整體的努力所致，但亦園兄付出最多，貢獻亦最多，這是亦園兄書生事業的另一成功展現。他做事與做人一樣，認真、公正、有為有守、有度有節。我參與基金會與亦園兄共事多年，是我一生中難忘的愉快經驗。

2010年，李亦園先生因健康原因，決定讓賢，辭去了基金會董事長之職，自此，我每次從香港到台灣開會，就難得與亦園兄見面了，即使在兩年一次的中研院院士會議中，也不見他的身影了。年前，在院士會議之後，我與芝加哥大學的刁錦寰院士到亦園兄寓所探望他，他講話慢了，體態也弱了，可是思維仍然清明。當然，我已看不到他以前那股精氣神了，但我絕然不覺得他已走近人生的盡頭。今天，亦園兄畢竟是走了，我真感到無奈。

此生此世，我在這個世界已活了八十年有多了。八十多年中凡與我同生斯世的人不能不說是「有緣」的，但有緣卻也有「有幸」與「不幸」之分。一種人，我是深感「有緣有幸同斯世」的，另一種人（還好少之又少），我卻感到「有緣不幸同斯世」。李亦園先生不止與我「同斯世」，還是屬於同一世代的，我與亦園兄結識半個世紀，我十分珍念我們五十年的相知相重、淡交如水的情誼，我要對亦園大兄說：「有幸與君同斯世」。

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，中央研究院院士。